



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

中国现代 文学史 (修订版) 上册

郭志刚 孙中田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ISBN 7-04-007233-5



9 787040 072334

定价 22.10 元

I209.6
24
:1

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

中国现代文学史

(修订版)

上 册

主编 郭志刚 孙中田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富仁 孙中田 林焕标

周葱秀 姚春树 郭志刚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册/郭志刚,孙中田主编;王富仁
等编. - 修订版.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005 重印)
ISBN 7-04-007233-5

I. 中… II. ①郭… ②孙… ③王… III. 现代文学 - 文学
史 - 中国 IV.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1065 号

书 名 中国现代文学史(修订版) 上册
作 者 郭志刚 孙中田 主编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免费咨询	800-810-0598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总 机	010-58581000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经 销	北京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http://www.landaco.com.cn
印 刷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版 次	1989年1月第1版
开 本	850×1168 1/32		1999年6月第2版
印 张	15.75	印 次	2005年4月第11次印刷
字 数	400 000	定 价	22.10 元

凡购买高等教育出版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
质量问题,请在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7233-00

目 录

绪论	1
----------	---

第一编 新文学的播种与收获(1917—1927)

第一章 文学革命的先声	33
第一节 西学东渐之后中国文化思想的历史变迁	33
第二节 从音标文字运动到白话文运动	42
第三节 晚清文学的繁荣及其现代化的趋势	48
第二章 文学革命的发生与进展	55
第一节 从思想启蒙到文学革命	55
第二节 对复古派的斗争和新文学阵营的分化	63
第三节 文学社团与文学期刊的涌现	69
第四节 初期革命文学的倡导	76
第三章 新文学初期的理论建设	81
第一节 现代文学观念的确立	81
第二节 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等的文论	84
第三节 西方文艺思潮的引进与选择	95
第四章 新文学各类创作的兴起与发展	101
第一节 新诗的尝试与成长	101
第二节 小说的创新与进展	109
第三节 话剧的引进与建设	114
第四节 散文的发生与自觉	124
第五章 鲁迅(上)	129
第一节 生平与前期思想	129
第二节 《呐喊》与《彷徨》	135
第三节 《阿Q正传》	146

第四节 《野草》与《朝花夕拾》	155
第六章 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创作	164
第一节 叶圣陶及其创作	164
第二节 冰心、庐隐及其创作	169
第三节 许地山、王统照、王鲁彦及其创作	177
第四节 朱自清及其创作	184
第七章 创造社诸作家的创作	190
第一节 郁达夫的小说与散文	190
第二节 创造社其他作家的创作	201
第八章 郭沫若	208
第一节 生平思想和美学主张	208
第二节 《女神》	214
第三节 《星空》、《前茅》、《恢复》和《瓶》	221
第四节 早期剧作与小说	225
第九章 其他社团流派的创作	229
第一节 语丝社和周作人的创作	229
第二节 乡土田园小说的兴盛	234
第三节 沉钟社及冯至的创作	240
第四节 闻一多、徐志摩与“新月诗派”	244
第五节 李金发与象征诗派	251
第十章 革命文学的最初实践	255
第一节 蒋光慈的诗歌与小说	255
第二节 瞿秋白的散文	261
第三节 革命文学开拓者的足迹	264

第二编 新文学的兴旺与繁荣(1927—1937)

第十一章 从革命文学的倡导到左翼文艺主潮的形成	271
第一节 革命文学的倡导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	271
第二节 尖锐复杂的文艺思想斗争	278
第三节 文艺大众化运动和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	287
第十二章 30年代文艺理论和批评的发展	299

第一节	左翼文艺理论的译介和建树	299
第二节	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发展与深化	304
第三节	其他流派的文艺批评	306
第十三章	鲁迅(下)	309
第一节	鲁迅后期的思想与活动	309
第二节	鲁迅杂文	313
第三节	《故事新编》	321
第十四章	茅盾	325
第一节	生平 and 早期文艺思想	325
第二节	从《蚀》到《虹》	331
第三节	长篇小说《子夜》	338
第四节	短篇小说创作	345
第十五章	30年代小说的长足发展	349
第一节	理论的深化与创作的活跃	349
第二节	左翼新人的小说	352
第三节	丁玲的小说	357
第四节	“东北作家群”的崛起	358
第五节	坚实的现实主义作家群	361
第六节	“京派”与“新感觉派”小说	366
第十六章	巴金	370
第一节	早期的生活与艺术探索	370
第二节	“激流三部曲”的创作	373
第三节	短篇小说与散文创作	381
第十七章	老舍	384
第一节	老舍的艺术视野与幽默风格	384
第二节	走向成熟的中、短篇小说	391
第三节	《骆驼祥子》	395
第十八章	沈从文与李劫人	401
第一节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	401
第二节	李劫人的“大河小说”	408
第十九章	戏剧文学的茁壮成长	415

第一节	左翼戏剧运动与创作	415
第二节	田汉、洪深的新剧作	418
第三节	夏衍和李健吾的剧作	426
第二十章	曹禺	432
第一节	生平与创作	432
第二节	《雷雨》	433
第三节	《日出》与《原野》	439
第四节	在中外戏剧艺术的融汇中实现超越	443
第二十一章	30年代诗歌的多样选择	446
第一节	殷夫及中国诗歌会诸诗人	446
第二节	臧克家、艾青、田间等新诗人的崛起	453
第三节	戴望舒与现代诗派	462
第二十二章	30年代的散文创作	473
第一节	杂文的兴盛	473
第二节	“论语派”的形成与“小品文的危机”	479
第三节	抒情散文的创新和游记的丰收	483
第四节	报告文学的兴起	490

绪 论

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可以追溯到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夕,它是晚清以来近代文学和思想启蒙运动逐步推进的结果,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直接产物。1917 年 1 月,胡适在《新青年》第 2 卷第 5 号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以空谷之音震动了文坛;同年 2 月,陈独秀又在随后出版的《新青年》第 2 卷第 6 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进一步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与这些文学革命倡导者的声音相呼应,1918 年 1 月出版的《新青年》第 4 卷第 1 号上,首次掲載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三人写的 9 篇白话新诗。5 月,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新青年》第 4 卷第 5 号上发表。作为一篇在思想观念和表现形式上都具有充分的现代形态的杰出小说,该作在舆论界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并为我国现代文学奠定了第一块强有力的基石。至此,文学革命在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都已开花结果,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事实上已经开始。1919 年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巩固和扩大了文学革命的成果。作为这个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革命的影响迅即波及到北京以外的各个地区,在全国范围内动摇了旧文学的统治地位。正因为如此,作为一个鲜明的历史标志,人们不仅喜欢用五四运动记录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也喜欢用它记录我国文学的新纪元。

五四运动既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也是一次深刻的文化启蒙运动,它对我国文学史乃至整个现代史的划时代的意义和影响,已为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实践所证明。早在 1940 年,毛泽东在阐述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的时候,就这样说过:“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

个不同的历史时期。”^① 对这两个历史时期的文化,他作了如下的论断: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②

这是在五四运动过去 20 年之后对历史的一个总结。对于这 20 年在文化领域里发生的基本历史事实,毛泽东还进行了这样的归纳:“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

^{①②}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696 页、第 698 页。

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①应该说,这样的论断和描述是符合五四运动过后那 20 年的历史面目的。

从 40 年代到 90 年代,历史的车轮又朝前滚动了半个世纪,中国和世界的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上述论断和描述是否需要改写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在这半个世纪的前二十余年,上述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里的各项事业,继续得到了举世公认的发展和壮大,并终于将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由积极的宣传变为全面的实践。在这半个世纪的后二十余年,特别是 80 年代末期以来,出现了人们难以想象的复杂局面;但这种局面的出现,并不能归结为共产主义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的失败,因为归根结底,出现人们已知的那些演变,不是坚持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结果,而是放弃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结果。文学的美感源泉和鼓舞力量,来自对生活的正确描述和高尚信仰以及对真、善、美的不懈的追求。对于本世纪 20 年代前夕诞生的我国现代文学来说,它始终是与时代的先进潮流采取同一步调的。因此,就总体而言,它不可能不超越一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局限而与本世纪初勃兴于欧亚大陆的先进的共产主义理想相联系。在资本主义体系不断加强对贫困国家的掠夺并把世界推向战争深渊的时候,这一理想及其在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中的光辉实践,使被压迫人民看到了前途。半个多世纪以来备受列强欺凌的我国人民及进步作家,理所当然地受到这一理想的鼓舞,并且在自己的写作生活中接受它的指导或制约,为读者描绘新的画面、新的希望——或者说,他们在自己的艺术活动中,寻找到了有别于一般西方文学的新的美感源泉和新的鼓舞力量。这些,正是与我国新文学的诞生相伴而来的一种现象。只要翻开当时出版的一些进步刊物,几乎随处可见新思想的闪光:“现在有一股浩浩荡荡的新潮起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697~698 页。

于东欧”，“诸位不见俄罗斯的革命，奥匈的革命，德意志的革命，就是这个新潮的起点吗”？“以前法国式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以后俄国式的革命是社会革命”，“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就是二十世纪的世界新潮”，“与其崇拜雷颉奴 Richelieu 的理财，不如崇拜马克思 Kal Marx 的经济”^①；“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②。诗人们也不甘寂寞，他们用富有乐感的句子，加入了创造新的文学时代的合唱：“一九一九年末日的晚间，/有一位拿锤儿的，/一位拿锄儿的，/黑漆漆地在一间破屋子里谈天。/拿锤儿的说：/‘世间的表面，是谁造成的？/你瞧！世间人住的、着的、使的，/哪一件不是锤儿下面的工程？’/拿锄儿的说：/‘世间的生命，是谁养活的？/你瞧！世间人吃的、喝的、抽的，/哪一件不是锄儿下面的结果？’/冬！冬！！冬！！/远远地鼓声动了！/一更……二更……好像在那儿说：/‘工！农！/劳动！劳动！！/不公！不公！！/不平！不平！！/喂！起来！起来！！/现在是什么时代？——/一九一九年末日的二十四时完结了，/你瞧，这红色的年儿新换，世界新开！’”^③

应该说明，上述各文的作者并不属于人们常说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或左翼；惟其如此，作为一种典型的历史现象，就更有说服力。这些事实说明，“五四”以前就受到欧洲文学强烈冲击和深刻影响（没有这种冲击和影响，新文学不可能产生）的我国文学，在“五四”以后没有、也不可能走上欧洲文学的老路，“投入西方思想和文学的潮流”^④，而是具有了否定资本主义的新的内涵，属于一个新的文学纪元了。这个新的文学纪元，只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促使我国文学走上这条道路，是由于一种深刻的历史原因。

① 罗家伦：《今日之世界新潮》，载《新潮》创刊号，1919年1月1日。

② 蔡元培：《劳工神圣》，载《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

③ 刘大白：《红色的新年》，《旧梦》，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

④ 林语堂：《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转引自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台湾正中书局印行。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由统一的闭关自守的封建国家,渐次沦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一向以世界中心自居的老大帝国,从此坠入屈辱和灾难的深渊。亡国灭种的危险震动了一个沉睡的东方古老民族,最先觉醒的是她的敏感的知识界。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以变法自强相号召,在光绪皇帝支持下发动了“百日维新”。结果,包括废八股、兴学校、开工厂等内容在内的“新政”仅颁行三个多月,即以“六君子”(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被杀,光绪帝被囚和康、梁出逃的悲剧结局告终。但“新政”的失败也换来了人们的进一步的觉悟:“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①。下一个回合,便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历史上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比,辛亥革命远远没有完成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因此,长期以来,辛亥革命被史学界看作是一次很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孙中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作为一位将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中华民族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他根据当时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审时度势,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英明方针。从此,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中国革命经过多次反复,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胜利,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业。

我国现代文学正是在这一宏伟的历史背景下孕育而成并展开错综复杂的历史、人生图画。正如中国革命在新的历史曙光升起之前,曾有无数的先辈在漫漫长夜奏起迎接黎明的序曲一样,在我国现代文学的正剧开场之前,也有一个长长的序幕。

19世纪后期在中国大地上吹起的维新与改良之风,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开花结果,但在文学上的成绩却是斐然可观的。这是因为,在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处于前沿的位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置。换言之,要革新政治,必先革新舆论,革新舆论的重要传播手段——文学。当时,由梁启超、黄遵宪、夏曾佑等提出的“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的口号,就适应了这种需要。维新派为什么如此重视文学形式呢?梁启超曾做过如下论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①在这里,“新”是时代刺激出来的一种需要,也是变革的一种推动力量。以文学而论,“自欧势窜入,政府窘迫,一蹶再蹶而后,相顾失措,四望彷徨之时,脑筋之影泡顿渴。此时正宜慎选其材料,改换其方略,以注射之,使其新知新识,焕然充发……”^②当时的爱国诗人和作家们,迫于国势陵夷、行将不保的巨大危机,常常满含热泪,冀图以文学为手段,唤起同胞强国保种的自觉。在他们的文字著述中,读者随处可以感受到那种慷慨悲歌的时代氛围。如林纾在与别人合作翻译外国文学名著时,就不止一次地且译且泣。他形容自己的心情是:“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近年美洲历禁华工,水步设为木栅,聚数百远来之华人,栅而钥之,一礼拜始释,其一二人或逾越两礼拜仍弗释者,此即吾书中所指之奴栅也。”“无国之人,虽文明者亦施我以野蛮之礼,则异日吾华为奴张本,不即基于此乎?……今当变政之始,而吾书适成,人人既蠲弃故纸,勤求新学,则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海内有识君子,或不斥为过当之言乎?”^③言为心声,一个时代的文学,也只能是一个时代心灵呼声的反映。当我国在接踵而至的由帝国主义发动的鸦片战争(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和1856

①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② 海天独啸子:《〈空中飞艇〉弁言》。

③ 林纾:《〈黑奴吁天录〉跋》。

年至 1860 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1883 年至 1885 年)、中日甲午战争(1894 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0 年)等历次侵华战争中一辱再辱、国家存亡系乎进退之际,有着两千多年优良传统的我国文学及爱国作家们,是会弃旧图新、幡然思变的。认真地说,不变也不行,因为国家赖以生存的根基(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等等)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面对新的现实必然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不只包括内容,也包括形式和语言,因为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维新派从开启民智、改良群治的愿望出发,必定注重文学的普及性(虽然他们眼中的普及,在今天看来是很有限的),他们不仅要将在一定程度上从原有的“载道”框架中解放出来,也要使之从贵族化的、僵硬的文言文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白话,甚至俗语、俚语在文学殿堂上得到承认,赋予其一定的审美价值。这就是说,时代变了,人们的审美观念或文学观念,也会随之变化。例如,他们认为,“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俚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本朝以来,考据学盛,俗语文体,生一顿挫……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已,凡百文章,莫不有然”^①。他们非常重视语言的社会功能,甚至提倡“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②。在这种思想引导下,有些作者进行了大胆的实践,甚至将白话引入人们认为最难变革的神圣的诗坛。如“诗界革命”的提倡者之一的黄遵宪,写了这样清新、活泼的诗:“进门爆竹声,群童喜欲狂;二三戴花媼,拥出新嫁娘。”他还用诗表达了这样的见解:“俗儒好尊古,日

① 饮冰(梁启超)语,见《小说丛话》,载 1903 年《新小说》第 7 号。

②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

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窃，妄造丛罪愆。黄土同抔人，今昔何愚贤？即今忽已古，断自何代前？明窗敞流离，高炉熬香烟，左陈端溪砚，右列薛涛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①由这一切所显示的晚清文坛上的变化，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种气候。显然，由1840年鸦片战争所引起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最终也引起了传统的文学观念的解体。

从康、梁等发动的维新变法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从政治方面说，是认识上和实践上的一个飞跃；但在文学上，并没有形成这种飞跃。这主要是由于活跃在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还没有来得及在文学上作出独立的贡献，便被“同化”到下一个历史进程——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去了。

总之，在新的文学革命的时代正式到来之前，改良派已把文学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在这一步中，已深深地埋下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契机。

“五四”文学革命的鲜明意义在于，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了晚清文学革故鼎新的进步传统，而又批判和放弃了它的改良主义色彩，使文学在革命的旗帜下，沿着民主、进步和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

这一文学变化过程，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人们还能看到，所谓近代文学的启蒙，是与救亡同步的，是在救亡中完成其历史使命的。在这一点上，我国文学与欧洲文学不同。欧洲文学由于自己的历史发展特点，其启蒙作用主要表现为唤起个人的自觉，把人从宗教和封建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和与之相应的人文环境。“五四”时

^① 黄遵宪：《杂感》。

代,我国文学界也曾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也曾提出要过“人的生活”,要唤起“个人的自觉”,把人从“忠君”、“事亲”、“卫道”等重重枷锁中解放出来。在这方面,它确与欧洲文学有相似、相通之处。但无情的客观事实是,大半个世纪以来,列强的侵略,已使贫穷、落后的中国国土沦丧、经济破产、民生凋敝,加之连年军阀混战,疫祸横行,使偌大的中国到处是一片啼饥号寒、破败不堪的凄惨景象。中国要“新人”,要“唤起人的自觉”,那就不仅意味着要从封建束缚、封建道统下解放出来,还要从列强侵略和压榨下解放出来,即不仅要有欧洲国家一般意义上的“人的解放”,还要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特殊意义上的“民族的解放”。换言之,我国近、现代文学的启蒙主义的特色在于把人的自觉和民族的自觉结合起来,在于把人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即国家的兴旺富强结合起来。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使启蒙和救亡结合起来。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中国步入近代时期以后,国内外各种势力、矛盾的相互冲突,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对所谓启蒙与救亡的关系的解释,也是不能带主观随意性的。归根结底,这是历史生成的一种特色。

由上可知,就启蒙主义本身来说,我国近、现代文学承担的历史使命(或者说它的历史内涵),要比欧洲文学广大。鲁迅在谈到他的《狂人日记》时,曾说它比果戈里的同名小说“忧愤深广”。以此作为对于我们讨论的这个题目的评价,或对于我国整个现代文学的总体评价,也未尝不可。当然,这是就作品的主题内涵或思想特色来说的,并非说我国现代文学的整体艺术水平超过了别人;相反,就后一个方面来说,我国现代文学还是非常年轻的,它跟世界文学在某些方面还有较大的差距。

“五四”以后,我国文学按照自己的历史逻辑发展了下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于历史环境的不同,较之欧洲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更富有战斗性和进步性。在短短的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从最初的文学革命到20年代前期的革命文学,再到20年代后期乃